

日本二千六百年史

日本：大川
周明博士著



政治叢刊 第五種

日本二千六百年史

中華民國三十年八月一日出版

著者 大川 周 明

譯者 雷 治 月 刊 社 鳴

發行者 政治月刊社

上海郵政信箱一七〇六號

經售處 街燈書報社

上海歐嘉路六十六號

建國書店

南京中山東路太平路口

三通書局各地分銷處

中央書報發行所各地分銷處

上海五洲書報社 羣衆雜誌公司

至誠堂 復興書報社 內山書店

上海書店 大陸書房 日本堂

定價 每冊國幣二元

譯序

我現在把這本「日本二千六百年史」譯竣，心裏不免發生一種感想。當我個人開始參加和平運動時，自己對於日本究竟是怎樣的一個國家，實在並沒有絲毫認識。誠然，在這以前，我也曾跟着別人一樣的批評過日本現代的種種政治或思想潮流，例如右傾左傾，法西斯主義，保守派，自由主義派。只要日本國內的政情稍有波動，自己雖根本不懂解日本是怎樣的一個國家，但却居然像那輩自命「日本通」者一樣，竟能對她批評得體無完膚，而且覺得非常得意。其實就兩個在交戰中的國家言，彼此各爲其主，歪曲的批評原是家常便飯，不足爲奇。若使歪曲而竟能挽救自己的國家，那麼這件工作就是現在我也還是願意幹的。然而抹殺事實真理這條路畢竟走不通。我們站在偏狹立場上所批評的一切東西，並不就是這一切東西的本來面目。我們從現象上看取的日本，並不就是真正的日本。譬如當我們在抗戰之初，自信經過十月到一年的戰爭，日本是會自然而然的崩潰的。她國內的貧乏經濟資源，她政治上的種種東南西北的派別，一定會使她自然崩潰的。然而戰爭到今天已十足四年，日本的經濟並未倒坍，政治上雖有傾軋，但每次傾軋的結果，不是將近崩潰而倒是益見舉國一致。當然，有人也許會說眼光別看得太短，照目前情形展開下去，日本是遲早要崩潰的，問題不過是時間。其實問題倒確乎是在時間，不過這時間條件不限於日本，中國本身也不能離開這個時間條件。中國是否能夠競爭上在時間的支撐得過日本呢？要答覆這一問題，我們單看今天日本的現狀是不够的，我們還應該看一看一貫的日本歷史。

我個人參加和運之初，就懷着這樣一種批判性的懷疑心理，我動手翻譯這本「日本二千六百年史」，也就是要爲的解答自己這種心理。而且我相信這種心理不僅存於我一個人。隨今天和平運動的日益發展，和平理論的文獻也日益在增加起來。就中就有不少是從中日的歷史關係來闡發和平理論的。但大多數的缺點，不是將中日關係說得太籠統抽象——例如泛言中日千餘年的文化關係等等——便是太過於拘束於現象的歷史事實——例如說因歐美帝國主義的挑撥，中日才發生這場戰爭等。以諸此立論來解釋中日爭戰的不當有固無不可，若欲重建中日間的真正新關係是不够的。

總之，因抗日而將日本的一切拒之千里以外，因親日而便將日本的一切都放在第一位，都不是我們應有的態度。中日間既已發生了這場東方史上空前的大戰，則無論爲戰爲和，我們都需要對整個的日本有一歷史的理解。戰的狀態畢竟不能長期存在，和的常態遲早總要到來。但既因中日間因過去的誤會積集發生了這場戰爭，我們要說永久的和平，就絕不能馬虎了事。有人曾說中日戰爭是糊裏糊塗打起來了的，這種說法正難與否姑置不論；但糊裏糊塗和下去却會斷送了中國，這一點我們是應該慎重記住的。

需要瞭解日本，這是此後中國立國的一個基本要求。今日局部的和平要求如此，他日全面的和平更要求如此。過去中國對於日本研究的工作確是做得太少，我們甚至沒有一本比較可讀的日本國家歷史。對於歷史淵源如此深刻的一個國家，地理關係如此相近的一個國家，我們竟沒有一本適當的歷史，這是值得我們自愧和反省的。前人固不乏有指出中國應研究日本歷史的重要者，但到現在爲止，我們還沒有看見事實的成就。

這裏所介紹的這本「日本二千六百年史」，就在日本本國也是被推索的一部史作。現在我把它全

譯過來，雖不敢說讀了此書即能算得全部瞭解了日本，但至少也能給用心的讀者留下一個有系統的日本國家歷史的概念。如果現在從事中日和平運動的人，能够因此書而引起更進一步研究日本歷史的興趣，那就符合了我介紹此書的目的了。

通常歷史書往往不免枯燥，不過本書却是一個例外。作者將史實和見解並陳，有時也許不免失之主觀，但這種見解在幫助我們對日本既往的瞭解上，却有很多好處，這在讀者自可細細去領會。這部歷史的最大優點，我個人認為是在以文化的觀點敘述史事的一點，因此既富學術性，也富興味。至於文字的優美，因原作者是日本一流的學者，對於漢文富有素養，所以縱使經過了譯文的一番糟蹋，也還能相當保存，這誠使譯者的工作輕鬆了不少。

最後，本書所根據的原文，是一九三九年七月十四日第一書房戰時體制版初版。其中多章曾先後在「興建月刊」及「政治月刊」發表過，且曾參考滿洲帝國協和會出版的同作者所著之「日本文明概略」，固有若干章幾與本書全同。謹此一併聲明。

雷鳴

民國卅年七月十九日

原序

海卡德斯，海洛杜斯及杜其台斯三人，是被奉作西洋史鼻祖的古希臘三大歷史家。這幾位歷史家，約每隔半世紀出現於世，各人對於歷史的見解傳有如下說法：在西曆紀元前五百年出世的海卡德斯，認為歷史是傳達過去的智識與現在；其次西曆紀元前四百五十年出世的海洛杜斯，則認為歷史是由過去說明現在；最後紀元前四百年代的杜其台斯，則說歷史是以過去與現在察知未來。換言之，即海卡德斯置歷史的重點在過去，海洛杜斯置之於現在，杜其台斯則置之於將來。三者的主張各具理由，但唯有綜合三說，始能全部發揮歷史的全貌。

不庸說得，歷史是研究人類發展路徑的東西。然而人類發展的路徑，因為內在於人類生命的發現，因此而一貫綿綿常繼不絕的。我們僅由於方便起見，劃分了過去，現在與將來。現在就是由過去所生的刻刻的過去，未來就是孕著於現在的刻刻的現在。真正的實在存在，只有滾滾不盡的生命之流。因此我們是常常生在永遠的現在中的。不過因為這種『現在』，其間蘊蓄着無限的過去，包含着無窮的未來，故歷史就是關於過去，現在和未來的東西；更進一層言之，歷史不得不由過去說明現在，以現在察知未來。

想到這裏，就想起了水戶的彰考館。彰考館是德川光圀所創立的水戶藩修史局，大日本史在這裏編纂一事，是周知的事實。這修史局所以名為彰考館，大概是根據晉杜預在春秋左傳集解序中的『彰往考來』的一語。這『彰往考來』，與易經的繫辭傳上的『彰往而察來』及論語上的『溫故而知新』，

完全是同一的思想，意思即彰過去而察將來。歷史正就是彰考。從而以彰考館命名修史局，實在最適切不過。彰考館的命名者，比之古代的三大歷史家，更一層精確地把握了歷史的本質。

日本歷史是日本國民生命的發現。此種生命，自肇國以來，繼續不斷地發展，周流充實於日本國家及於今日。生於日本的一切國民，在自身中均寓有此種生命。如果探討我們的生命的深處，即可發見在這裏潑刺躍動的生命。隨時間的程序而認識此種生命者，即是歷史。因此歷史云云，不外就是從時間的程序組織自我內容之體系，讀日本歷史，就是認識日本人的本來面目。陸象山以六經不外爲自己的註腳，歷史亦然。即六經由理論作自己的註腳，歷史則由事實作自己的註腳；經史相乘，我們始得完全的註腳。

現在日本正處於興亡的歧路。爲圖善處此種非常難局，置君國於富嶽之安，以期進而實現莊嚴的理想，就必得讀歷史，俾究日本及日本人的真實面目。胡三省在評司馬溫公的資治通鑑中曾說：「究古人之得所而不知古人之失所，則求勝而敗，圖利而害，乃爲必然之理」。吾人必得由歷史而抓住支配日本生命的法則。而且必得從此法則而行動。若果如此，則反省日本國史之必要，實無如今日之甚者。本書乃就舊著加以若干之訂正，在此非常時期若得小事貢獻，作者當爲之快慰不已也。

一九三九年六月

大川周明

原书缺页

第十三章	改革宗教的道元禪師	(七二)
第十四章	蒙古來襲的前後	(八一)
第十五章	建武中興	(八五)
第十六章	室町時代	(九一)
第十七章	戰國時代之文明史的意義	(九六)
第十八章	新時代開拓者織田信長	(一〇〇)
第十九章	海外發展精神之勃興及其挫折	(一〇五)
第二十章	基督教的傳來	(一一一)
第二十一章	基督教的禁制	(一一五)
第二十二章	德川時代之社會及國家	(一二五)
第二十三章	德川時代初期之文化	(一三一)
第二十四章	德川時代思想界之新精神	(一三七)
第二十五章	德川時代之西洋學術	(一四六)
第二十六章	幕末日本的困難	(一六〇)
第二十七章	應崩潰之封建制度	(一七二)
第二十八章	尊皇攘夷與倒幕	(一八〇)
第二十九章	明治維新	(一八五)
第三十章	世界維新潮流中之日本	(一九四)

第一章 序 論

我們日本國民，是永遠綿延的日本之生命的一斷面。無論意識與否，無論是從國民總體言，或就每一個日本人言，我們實寓於日本歷史之全體而立於世。不知今日的日本，就難察明日的日本，同樣地不知過去的日本，亦不會曉得今日的日本。我們爲了正確把握生存於現在國家以及吾人自身起見，非得學習國史不可。誠如司馬溫公聚其畢生心血作資治通鑑一樣，歷史確是反映我們真實姿態的鏡子，所以學歷史就是認識自己的真面目。假使不認識自己的真面目，則正確的行動就不可能。因此經史二學在東洋，爲士人所必修的課程。經學即哲學，史學即是歷史。古人言學問，就是研究修身治人之道，從而就研究經史，所謂修身治人，即意味道德與政治，修身治人之道，即以公私人的身份正當處世之道。

學習歷史雖然那樣的重要，但現代最顯著的傾向却是輕視歷史。至少今日多數青年，對於本國的歷史殆無何興味，從而並無濃厚興趣學習國史。而尤其可驚的是，此種非歷史的傾向，在埋首於改造運動的青年間特別顯著。誠然，就一方面言，改造原是一切舊的破壞。此種改造的機運，變成了世界大戰以後的潮流，不問地分東西，凡有社會國家存在的地方，無不蒙其影響。日本的不能獨立於此潮流之外，自無待言。因此爲一切舊的東西，不論是風俗習慣，制度文物，乃至思想信仰，早不容許其照舊存在，一切非置之於改造或破壞的道路上不可。不過真的改造縱以破壞爲開始，却決不以破壞爲終極。其破壞非得爲建設目的之破壞不可。

如此說來，建設的原理應向何處去求？追蹈外國的先蹤，也確是建設之一法。或者可以說是最容易的方法罷。可作爲我們改造或革新社會國家的先蹤者，有蘇俄，有德意志，復有意大利。而我國青年之中，也有熱心地澈頭澈尾模倣着蘇俄，以圖改造我國的人、也有希圖模倣着莫索里尼之改革意大利的人。此外，純乎依據了理論，以求建設，也不失爲一種方法。但在我國所倡導的純理論，却總不出於西歐哲學和科學的理論。像這些理論，便是在西洋均無從實施者居多，欲使其在日本實現，幾完全等於空想。兩者均於吾人無所得。

不論怎樣的世界，怎樣的社會，非改造或革新不可這種事情，均是由國民的生命的衰弱和頹廢而生的。生命的衰弱與頹廢，乃由於善的力量弱，而惡的橫行跋扈之故。若欲改造，祇有認清了潛藏在國民的生命的裏的偉大之物，高貴之物，堅實之物，而使之復興；並打倒現下橫行不已的邪惡之一途。簡截地說，所謂改造或革新者，非是以自國之善討自國之惡不可。假借了看去做佛是外國之善的事物來，以代替自國之惡，便斷不可。因爲這種工作即令小心翼翼得到成功，不過是以竹接木，絕不是樹木的本來的生命的更新，而終令成爲別一枝竹子罷了。所以建設的原理，決非可以求之於他國，而必求諸於我們自己。而必求諸於我們自己的建設的原理，祇有讀習了自國的歷史，才能把握得到。遭逢着改造的必要的今日的時代，我們益加痛感到國史研究的重要了。

我國最初且最根本的歷史，乃爲日本書紀。朝廷爲什麼要編修這部歷史？此點乃於國家及歷史之關係，以及歷史的重要性之闡明上，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第一，國史的編修，爲國民的自覺所生。自覺和反省是相伴的。日本書紀，確乎是強大的國民之自覺及反省的產物。何以能有這種自覺呢？不待說因爲日本民族的發展，達到一定的程度之故。然而除了這內部的事情之外，還有直接而且有力的

外面刺戟的一因。此所謂刺戟，乃指與中國的接觸。「我」之確立，必待和「非我」之對立。在個人的場合上，民族的場合上，都是如此。日本因為和中國接觸了，才開始強大明確地生出國民的自覺來。

我國自與中國交通，至推古天皇以來（十三世紀），盛行攝取隋唐的文明。像大化革新那樣，從外表看來，日本完全有了小中國之觀了。但在反面，則日本的日本魂却秋毫無犯，完全未失。此徵之於我國當時對於中國之態度，便可明瞭。如聖德太子對隋之煬帝，送出了「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那樣的國書；又如天智天皇爲援百濟而與大唐帝國戰爭。惟其他們都是最熱心地採用隋唐文明的人，所以益加令我們感動不能自己了。正由於此，至桓武天皇之時，嘗編撰姓氏錄，將中國歸化民列入「蕃別之部」。就文化之點說；中國被奉爲模範；在編別時候，竟看作外番了。將此和今日我國之共產主義者，高呼蘇俄爲「吾之祖國」而不知恥者相比，真有天地雲壤之差。

似這樣一方面和中國接觸，而採用其文明；他方面國民的自覺也強大起來。爲明示內外日本建國之由來及其精神，以及其國體之尊嚴故，計劃於朝廷編修國史者，乃爲聖德太子；編成者有天皇記；國記；臣連，伴造，國造百八十部以及公民等之本記。然其中除國記之外，其他記錄，不幸於藤原氏共亡，其後國記亦竟散失，而內容遂完全不能考知。至天武天皇之世，重創撰修國史之業，迄元正天皇之時完成，名曰日本書紀，傳至於今日。其間，在元明天皇之時，太安萬侶嘗奉勅，記錄埤田阿禮之傳誦而成古事記。修史事業如是其旺盛，無疑是由於日本的自覺非常旺盛的緣故了。

日本書紀特別冠以國號者，不僅在令一般國民得知建國的由來及精神，並抱有對外國亦宣揚國體之尊嚴的目的而撰修的緣故。此外的歷史，則祇稱天皇記，國記，古事記之類，不特注「日本」兩字

了。所謂外國，自以中國爲主。當時的中國，適值唐朝的盛世，乃我國盛行汲取其文物制度的先進國。爲了對着這樣的先進國，明示日本的莊嚴的國體計，而撰修日本書紀，這件事實，便已足以證實日本精神的獨立不依而有餘了。惟其如此，所以文章乃用堂堂的漢文，借取漢籍的章句。以大事潤飾其記事。但也惟其如此，自本居翁而下，許多的國學者，均有尊重古事記而輕蔑日本書紀的傾向。然而吾人却不能贊同這種態度。雖然用的是漢文的文章，苦心於形容修辭，但絲毫不曾掩蔽了日本的眞面目。這若不是日本書紀的撰修者富有明確強烈的日本的意識而從事的話，是絕不能夠的。特如神代卷中，用「一書曰」這樣的筆法，列舉所有的異說，而不下半點兒臆斷，且不欲隱蔽事實之處，公平無私，海闊天空的日本精神，最顯著地表現出來了。不能不說是與古事記同爲最可尊重的古典。

日本書紀三十卷的完成，乃元正天皇養老四年（七一九年）的事情。朝廷於進奏的翌年，即養老五年始，便在宮中開設日本書紀的講筵，令親王，太政大臣，左右大臣而下，至參議爲止，都陪聽其講義，講義終時，賜全體與聽者以饗宴。名之曰竟宴。在竟宴時，取日本書紀中所有的人物爲題，令詠和歌，此事成爲常例。可以考見這是出於使當國務之人，而勿忘建國大義的用意了。似此，一方面開設了日本書紀的講義；他方面承日本書紀之後，連續撰修國史，遂成了所謂六國史。

這樣看來，國史之尊重，和國運之盛衰，常常是形影相隨的事，原毫不足怪了。何則，尊重國史，原便含有國民的自覺的強烈的意味的緣故。自藤原氏專權之後，日本書紀之講義和國史之撰修，一時均告中止。因爲闡明了日本建國的精神，反省日本國體的本義，明明是對藤原氏不利的。然而建國的精神失亡，國家斷無繁榮之理。平安朝的末期，即藤原氏專權的日本，幾乎完全陷入無政府的亂狀了。

後三條天皇重將朝廷自藤原氏手中收回，白河天皇更繼其遺志，讓位而後，創設所謂院政。院政也者，乃是以最不惹人注目的方法，而巧將政權收歸皇室的一種制度，吾人由此可以窺見天皇的偉大的政治手段。因為抱有這樣的雄志，所以憶起了廢絕已久的國史撰修之業，令藤原信西編述本朝世紀。及其後經保元平治之亂，政權又安全移入於武門，朝廷遂復不修史，且輟行日本書紀的講義。

後醍醐天皇的建武中興，雖然同天的偉業不幸中途遭了挫折。但運動之發生，顯然由於日本精神之勃興，這種精神最完美的結晶，乃是北畠親房神皇正統記的產生。自平安朝末葉至鎌倉時代初期，置國史於等閑。此事結局，必招國體觀念之昏瞶，且生出今日之所絕不許有的謬妄的思想來。例如慈鎮和尚的愚管抄裏所表現的思想是。慈鎮爲關白藤原忠通之子，但其著書之中，提及天皇，竟均書作「國王」，甚至完全信受了禮記的百王之說，說出「皇統百代而盡」這樣妄誕至極的話語，且竟寫出「神代不可知，人代自神武天皇而後，開共百代，今已八十四代，所餘無多矣。」這樣的文句來。所謂八十四代者，是在順德天皇的時候說。謂從那時起，再經十六代，日本的皇統便將亡絕，其思想之可驚若是。承此時代之後，我們的北畠親房高唱「大日本神國也」，明確地力說神胤永永君臨此世，而應與天壤無窮，此真一句鐵錐崙，使虛空喝叫希有之快語。神皇正統記，誠爲前則遠瞻建國之創業，後則遙呼明治之維新之國史之中軸，此書一出大義名分所存之處，煥乎昭示於千載了。

室町時代，一開始國家便未能統一，應仁之亂而後，更加離亂。皇室的式微，到此時也可謂空前絕後。在這樣的時候，後土御門天皇再興日本書紀的講義，召吉田兼俱進講此書一舉，實可以看做日本精神再興的前兆。自此以後，日本書紀的講義逐漸開始實行，其初爲親王及公卿，其後地方的豪族也均招聘學者，聽其講述。至後柏原天皇及後奈良天皇，均極力銳志於朝廷之再興。稱作後柏原者乃

對桓武天皇而言，稱作後奈良者乃對平城天皇而言。後柏原及後奈良兩天皇，圖規復桓武、平城的盛世，可謂苦心孤詣之極了。如後奈良天皇，日常的美食都幾乎不繼。不得不賜臣民以宸筆，恃其謝禮爲生。窮困一至於此，然而在他的日記『每月朔日之條下』，却都寫著『萬國治平，百蠻歸服，朝廷再興，』或是，『海內靜謐，朝廷再興。』這種雄渾偉烈的精神，終於開丁人心嚮往皇室的風氣，其後戰國諸雄心多傾服皇室，垂至正親町天皇之世，有織田信長出，再興皇室，奉天皇而號令天下，豐臣秀吉繼承其後，對皇室益加尊崇，使國民得以重瞻天日。

德川氏宗敎式地尊重皇室，但將天皇政治的權力完全奪去。不待言，由日本的國體說來，是變則的政治。然而德川氏的獎勵史學，却大促進了國史的研究，自水戶藩編修的大日本史爲始，如『建大記』、『中興鑑言』，乃至如日本外史、日本政記之類，使國民得以反省國體之本義的許多的著作絡繹出現，遂促進了明治維新的機運。

以上的事實，最雄辯地說明了史學的消長與國家的盛衰，常常相伴。但與其說是歷史使得國家隆盛，更不如正確地說因史學而覺醒的日本精神，實爲興國之力。所以我們在如現在這種時代，想力述國史研究的重要性，惟有正確的國史的研究，才能使吾人體會得日本歷史之尊貴，日本民族之偉大，日本國體之莊嚴，使於一切非常時中知如何善處之道罷。這冊『國史讀本』，乃以我曾公之於世的『日本文明史』爲骨子，刪增了若干章而成之物，不過將平凡的一個日本人身中所潛藏的『日本』，依照着時間的秩序，而通俗地加以解說而已。若此著能够喚起國民，尤其是青年之魂，對於國史的關心話，則著者無限之歡欣了。

第二章 日本民族與日本國家

不論怎樣大的河，決非開始便是巨川。即以黃河揚子江之大，追溯其淵源時，也不過谷間的細流吧了，祇因能匯合多數的支流，且使全部的流水均向東海方面奔聚，遂自成爲千里之長江。不妨說，天下所有的長江大河之偉大，即在於能給注入自身的一切流水，以一個奔聚的去向。如此，也便同時使得自身豐，巨，且強起來。

吾人精神生活方面，又何嘗不然。個人之魂，民族之精神，亦斷不能生來便是豐富，莊嚴，偉大的。必待博學，深思，篤行，攝納注入自己的魂來的一切，且導與一個流向之後，才能逐步偉大起來的。因此，尼采解釋所謂偉大時，用「導給方向之謂也」一語喝破了。導給方向，指示方向，即是偉大之魂之力的表現。具有此力之魂，容受萬物，以豐育自己之精神，且由是付給一切以真正之意義與價值。

但導示他物以方向時，自身不能不先有一定的目標，一定的歸宿點。必待有目標，有歸宿點後，才能指揮注入自身的一切事物，才能由是使得自身偉大起來。目標，與夫魂向也者，不待言便是理想了。故謂吾人之魂之發展與充實，必待有了確定不拔之理想，始爲可能。第一，必先堅執一莊嚴偉烈的理想之魂，方纔稱得起偉大。

吾人現於將述日本歷史的時候，試先吟味一番日本國體的本義。想吟味日本的國體，則又不能不一省日本國民的精神，所謂大和魂的本質。何以故，柏拉圖說得非常明白，沒有一個國家，能如建築

在圍着的巖石上面的房舍；而都是以國民之魂作基礎，且以國民之魂作梁架構成的邸宅。所以造成日本國家，而且正在建造着日本國家的東西，端的便是日本精神，或者說是大和魂了。所謂日本的國體也者，意思便是指日本國家的特質。若不明瞭此國家的基礎同時亦即其材料的日本精神的本質時，到底底是無從把握得日本國體的太義的。

國體兩個字，依法律學的概念講來，意思是主權所在或統治權的組織的形體，例如君主國體，君主國體之類。不過吾人現在所欲吟味的，却並非法律學上的國體。吾人毫無意於此研究法律學的乃至政治學的國體，闡明其主權所在，或討論君主國體的性質，乃至比較君主國體與民主國體的優劣等等。吾人所欲思索的對象，乃是在說擁護國體，或是國體的尊嚴，或是國體的精華等等語句的時候的國體。意即日本國家的本來的真面目，唯一無二的日本國家的特質。一切的個人，都具一個他人絕無的獨特的個性；同樣，一切的國家，也必有其國所獨有無二的個性。又正如一切個人的真正意義與價值，若不實現其他人絕無的獨特的個性時，無從獲得一樣；一切國家的真正的意義與價值，必待將其國所獨有無二的面目完全發揮之後，才能確立。忘記了自家的面目，等於忘記了自己；放棄了自家的本領，實等於自殺。不問個人與國家，若尙欲營道義的生活，非嚴守康德的「道德禁模」一律不可。我們熱誠地來尋求日本國家的根本的特質，即是日本國體，其原因也就在此。同時我們也便不能不反省一下，生成而且現在仍在繼續滋育着大和魂的特質罷。

在日本精神的許多特徵之中，最著者，爲對於輸入的一切思想，文明，「導給方向」一事。正因爲這點，日本精神才偉大起來的。此完全和匯合了無數的支流，使其水盡向大海，且由是而得使自身豐育起來的長江大河的偉大一樣。吾人首先與中國思想，文明接觸，使其成爲吾有，復與印度思想，